

基于休谟—费雪框架的《管子》货币思想研究

张哲伟

湛江科技学院，广东省湛江市，524094；

摘要：本研究基于休谟—费雪货币数量论框架，系统探究《管子》货币思想体系的理论内涵、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究发现，《管子》以“轻重论”为核心，构建起涵盖货币职能、数量调节与国家干预的三位一体理论体系。其“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等论断，早于西方明确货币的交易媒介与价值尺度职能，且将货币提升为国家治理工具，与现代货币理论（MMT）形成呼应。在数量调节机制上，《管子》突破休谟—费雪框架的线性思维，通过“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等论述，关注货币在不同商品领域的流转差异，提出“轻重之术”实现物价稳定与经济均衡。“子母相权”理论下的齐国“泰轨”制度，构建双层货币供给机制，与现代中央银行调控框架逻辑相通。

对比休谟—费雪框架，《管子》秉持“货币国定论”，强调国家对货币的掌控以实现社会稳定与经济均衡；而休谟—费雪框架侧重物价稳定与市场自发调节。在当代，《管子》货币思想为央行数字货币监管提供理论依据，其与社会公平联结的理念契合普惠金融目标；“子母相权”思想为结构性货币政策提供借鉴，“国家—市场”协同治理理念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东方智慧。本研究揭示了《管子》货币思想在跨文化经济思想史中的独特地位，为现代货币理论发展与政策实践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管子》；休谟—费雪框架；货币数量论

DOI：10.69979/3029-2700.25.10.082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东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路径与思想内涵差异显著。休谟—费雪货币数量论框架作为西方古典货币理论的基石，长期影响着现代货币经济学的发展。而中国古代《管子》所蕴含的货币思想，以其系统性与前瞻性，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东方视角。重新审视《管子》货币思想体系，并将其置于休谟—费雪框架下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也能为现代货币理论的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的思路，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与核心目标。

2 《管子》货币思想体系的解构

2.1 “轻重论”的核心逻辑

《管子》以“轻重”概念为基石，构建起货币职能、数量调节与国家干预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展现出古代中国对货币经济的深刻理解。《管子·国蓄》提出“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明确阐释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流通属性，使得商品交换突破了物物交换的局限，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币者，所以准平万物”则凸显了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为商品定价提供了统一标准，稳定了市场交易秩序。而《管子·轻重乙》中

“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提升为政治治理工具，强调国家通过掌控货币发行与流通，能够实现经济秩序维护和社会稳定保障，这与现代货币理论（MMT）中货币作为国家信用载体的观点形成跨时空呼应，体现了《管子》货币思想的前瞻性。

在数量调节机制方面，《管子·国蓄》“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揭示了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反向关系。为更精确地刻画这一复杂关系，引入随机过程模型：

$$dP_t = \mu(P_t)dt + \sigma(P_t)dW_t + \theta(M_t - \bar{M})dt$$

其中， $\mu(P_t)$ 用于刻画物价在无外部货币冲击下的自然变化趋势，体现了物价自身的动态演变规律； $\sigma(P_t)dW_t$ 描述了市场随机因素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反映了经济环境中不可预测因素的作用； $\theta(M_t - \bar{M})$ 则着重体现货币数量偏离均衡水平 \bar{M} 时对物价产生的冲击效应。该模型突破了休谟—费雪框架的线性假设，引入随机扰动和动态调整机制，与《管子》对货币流通结构性差异的认知高度契合。以《管子·揆度》中“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描述的粮食市场特殊波动为例，通过设置时变参数 $\sigma(P_t)$ ，可模拟不同时期粮食交易中物价受货币因素影响的差异，从而更准确地解释货币在不同商品领域流转时对物价产生的差异化作用。

2.2 “子母相权”的动态货币管理

《管子》的“子母相权”理论是其货币思想中极具实践价值的制度创新，构建了包含货币层次管理、价格调控和市场预期管理的动态政策体系。《管子·揆度》指出“权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主张通过调节不同层次货币（“子币”与“母币”）的投放比例，实现物价稳定与经济均衡。在《管子·山国轨》记载的齐国“泰轨”制度中，丰年时国家以“母币”（基础货币）收购物资建立储备，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防止物价过低损害生产者利益；灾年时投放“子币”（信贷货币）救济百姓并回收物资，增加市场流动性，稳定物价。这种“政府主导—市场补充”的双层货币供给机制，有效解决了货币发行中的“可信承诺”问题，既保障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又维持了市场活力。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子母相权”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发行的双层治理结构。国家通过垄断“母币”铸造权掌握货币发行主动权，同时通过“子币”的流通实现货币的市场配置。这种机制与现代中央银行体系中基础货币与广义货币的调控框架存在深层逻辑关联，为当代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在数字经济时代，其分层调控思想与区块链技术结合，为构建新型货币治理体系提供了创新思路。

3 休谟-费雪框架的理论和历史局限

3.1 休谟货币数量论的哲学基础

大卫·休谟在《论货币》中提出“商品的价格总是与货币的数量成比例”，奠定古典货币理论基石。其“货币面纱论”认为货币流通仅影响名义变量，不改变实际产出与就业，体现西方自由主义推崇的市场自发调节思想。但该理论忽视“坎蒂隆效应”，在现实经济中，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新增加的货币并不会均匀地分配到各个经济主体手中，而是首先流入那些与货币发行机构或政府关系密切的部门和个人，这些先获得货币的主体能够在物价尚未上涨时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受益；而后获得货币的主体则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实际购买力下降。这种货币增发的非对称影响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加剧社会贫富差距，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在一些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率先受益，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而实体经济部门和普通劳动者却未能充分享受到政策红利，反而面临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

3.2 费雪交易方程式的数理化局限

欧文·费雪 1911 年提出的 $MV = PT$ 公式，将货币

数量论数学化。然而，其对 V 的外生固定假设与现实严重脱节。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的消费和投资意愿增强，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倾向于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此外，金融创新不断涌现，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制度变迁，如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税收政策的变化等，也会对货币流通速度产生影响。

4 两种理论体系的跨文化比较与分野

4.1 货币本质认知的哲学分野

在货币本质问题上，《管子》与休谟-费雪框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哲学根基。《管子》秉持“货币国定论”，《管子·轻重丁》强调“权轨之所行，远在诸侯之境外”，认为货币价值源于国家信用与政治权威。在中国古代，国家具有强大的统治力，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由国家严格掌控，货币不仅是经济交易的工具，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国家通过制定货币制度、规范货币流通，来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而休谟-费雪框架遵循“货币商品论”，将货币视为市场交易自发演化的产物。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自主，认为货币是在人们长期的交易实践中，为了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而逐渐产生的，其价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导致货币政策目标的分歧：前者以“通施御司命”为核心，追求社会稳定与经济均衡，国家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结构、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后者以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强调最小化政府干预，认为市场自身能够实现物价的稳定和经济的均衡，政府过多的干预反而会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

4.2 数量调节机制的路径差异

尽管两者均承认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联，但调节路径存在根本分歧。休谟-费雪框架依赖市场的“价格信号”自发调节，认为货币数量变化通过供需机制自动实现经济均衡。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物价上涨，生产者会增加供给，消费者会减少需求，从而使经济重新达到均衡；反之亦然。这种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信息是充分对称的，经济主体能够迅速对价格变化做出反应。

而《管子》主张“轻重之术”的主动干预。《管子·轻重甲》记载“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通过货币铸造权垄断、物资储备调节、价格管制等多元工具，形成“数量—价格—实物”三维调控体系。在古代中国，国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物资，通过建立仓储制度，在

丰年储备粮食等物资，在灾年投放市场，调节供求关系，稳定物价；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调整货币铸造的数量、质量和种类，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经济运行。这种差异在当代货币政策实践中依然延续——美联储的利率目标制主要依赖市场机制，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货币供求和经济活动；而中国央行“价格型+数量型”的混合调控模式，则既注重运用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又不忽视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工具，体现了对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综合运用，与《管子》的“轻重之术”在理念上有相通之处。

5 《管子》货币思想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启示

5.1 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范式启发

在数字货币时代，《管子》“货币—权力”思想为央行数字货币（CBDC）监管提供理论依据。《管子·轻重戊》“君守布则布重，君守帛则帛重”强调国家对货币的掌控力，与现代国家发行 CBDC 以强化货币主权、提升监管效能的理念相符。中国数字人民币（e-CNY）采用可控匿名设计与双层运营体系，实现货币流通监测与风险防范，正是这一思想的创新实践。同时，《管子》将货币职能与社会公平联结的理念，契合现代普惠金融目标，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普惠金融使全球超 10 亿人获得金融服务，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5.2 动态货币管理的实践价值

面对结构性通胀等经济难题，《管子》“子母相权”思想极具解释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传统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中国央行 2020 年疫情期间实施的定向降准、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通过差异化调节基础货币与信贷货币供给，精准支持小微企业、制造业等领域。数据显示，2020 – 2021 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平均水平，CPI 保持稳定，实现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平衡，彰显该思想的实践价值。

5.3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重新审视

《管子》“国家 – 市场”协同治理理念，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东方智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结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实现气候目标，与《管子》“轻重相权”思想相呼应。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推出《数据安全法》等政策，平衡市场活力与国家治理，体现了通过政策协同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这些实践表明，《管子》货币思想能为解决全球化经济难题提供新视角与方案。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将《管子》货币思想与休谟–费雪框架进行深入比较分析，清晰展现了两者在理论建构、货币本质认知及数量调节机制等方面的异同。《管子》以“轻重论”和“子母相权”为核心的货币思想体系，在强调国家主导的货币治理模式、关注货币流通结构性差异等方面，展现出超越时代的理论洞见。其与现代货币理论及政策实践的诸多契合之处，充分证明了这一古代思想体系在当代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层面看，《管子》货币思想为现代货币理论提供了范式启发，拓宽了货币职能认知的边界，推动了货币理论研究从单一视角向多元协同视角的转变。在实践领域，无论是数字货币监管、结构性货币政策制定，还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管子》的思想都能提供独特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未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与理论研究的深入，《管子》货币思想有望在更多领域发挥其理论价值，为解决复杂经济问题贡献东方智慧，促进东西方经济思想的交融与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1] 余洋. 论《管子》中蕴含的强国思想[J]. 今古文创, 2025, (16): 61–63.
- [2] 马腾, 刘薇. 《管子》整全规范理论体系论绎[J]. 管子学刊, 2025, (02): 5–20.
- [3] 吴小丽, 刘艳娜, 王欢. 《管子》的国家治理思想与当代价值[J]. 安顺学院学报, 2024, 26 (05): 107–114.

作者简介：张哲伟(1999-)，男，汉族，湖南永州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研究、经济史研究、经济理论研究